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5.1

4 issues a year in 15 languages

查理週刊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通往公共社會學

Nira Yuval-Davis

批判介入

Issa Shivji

資本主義和氣候正義

實踐公共社會學

Ariane Hanemaayer and
Christopher Schnei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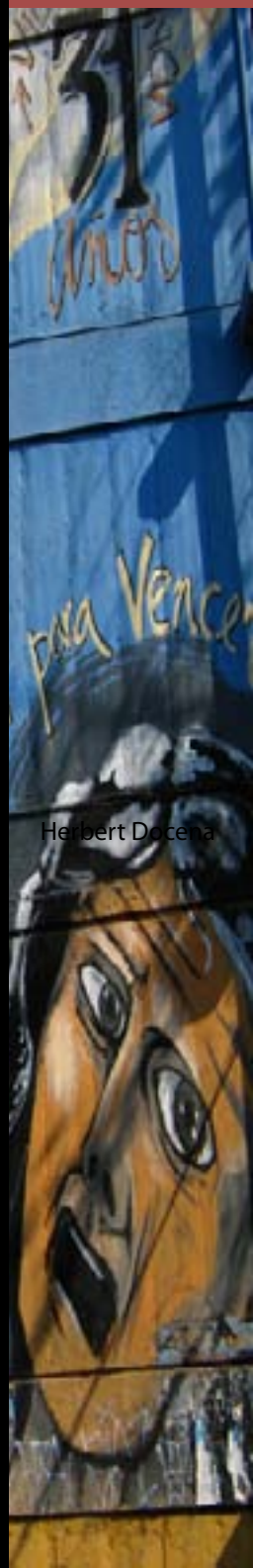
全球論壇

- > 非正式場域的抗爭
- > 法國工作型態的轉變
- > 印尼社會學

MAGAZI-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erbert Docena

VOLUME 5 / ISSUE 1 / MARCH 2015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論作為一位公共社會學家

這期的全球對話由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的文章開場，主要是討論法國 Charlie Hebdo 的漫畫家的屠殺慘案。若是有什麼事件特別要求社會學家的分析視野時，那這個事件就是回應了這樣的呼籲。這篇文章分析了這起殺人案的理由，兇手的背景本質，漫畫的影響，法國政府的回應，以及大眾的聲浪。我們所學習到的是，所謂的「言論自由」並不總是被賦予的，而更像是一個充滿衝突的場域，這對於「穆斯林」和「恐怖分子」這兩個概念也是如此——一個恐怖分子很可能是另外一個社群自由鬥士。總之，Santos 專業的分析下，我們看到了一個全球的視野。我們必須從暴力和極端主義的結構中去看待整起事件，而更不能忽略了國家通常也是暴力和極端主義的行使者的這個往往被忽視的觀點。

這起兇殺事件很值得社會學的分析，但是社會學家默不作聲，害怕在這個複雜的領域中留下印記，也害怕成為公共社會學家。的確，成為公共社會學家是一件危險的事。而 Nira Yuval-Davis 指出兩條公共社會學的路：第一是自我放逐，成為學界的邊緣人，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以色列社會學家 Baruch Kimmerling，研究以色列的核心議題，但是卻用很批判的角度觀之。面對非洲各種不同的挑戰，Issa Shivji 的文章描述了運動者同時也是學者的公共社會學實踐，批判坦尚尼亞的政府，並捍衛大學的自主性。

公共社會學並不必然危險的，但是一定很複雜且重要。Herbert Docena 已經報導了聯合國企後變遷的會議好幾次，這次他把重點放在日益茁壯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如何要求更進一步的介行動。最後，公共社會學也可以在地化實踐，像是 Ariane Hanemaayer 和 Christopher Schneider 所指出的，在咖啡廳中可以把大學帶入公眾之中，以及開放的教室如何把公眾帶到教室裡面。

這期的全球對話也報導了三場論壇會議。第一，是有關於都市開發和土地驅離的議題，這發生在智利、烏拉圭、哥倫比亞、南非、尚比亞。儘管對於住民的暴力相向，抗爭還是不斷持續，而且不是自願性的發動，而是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這有的時候很成功，可是通常以失敗收場。我們也也關於印尼的社會學動態的文章，有 5 篇文章討論民主如何型塑了宗教、教育、勞動、社會流動等。另外有 3 篇文章討論法國的工作模式：新式的實驗室，慢性疾病的的工作場所調整、多元積極社會的圖像：模糊了薪資勞工、無償的照顧工作、以及公民活動之間的界線。

全球對話以 15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是世界著名的葡萄牙社會學家和法學家，以全球的視野去分析查理週刊慘案。



Nira Yuval-Davis 是傑出的社會學家，領域是性別、人權。其和以色列社會學家 Baruch Kimmerling 的想像對話討論了公共社會學的道路。



Issa Shivji 是長期並且著名的左翼坦尚尼亞知識分子。其接受學生的訪談。



Global Dialogue is made possible
by a generous grant from SAGE
Publications.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Gay Seidman.

副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Pragya Sharma,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itra Daneshvar, Faezeh Khajehzadeh.

日本:

Satomi Yamamoto, Hikari Kubota, Takazumi Okada, Fuma Sekiguchi, Kazuki Uyeyama.

哈薩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Gulim Dossanova, Juldus Battalova, Almagul Nurusheva, Daurenbek Kuleimenov, Elmira Oтра.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Martyna Dolores, Mariusz Finkielstein, Weronika Gawarska,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Przemysław Marcow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Corina Brăgaru, Telegdy Balazs,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Ruxandra Iordache, Mihai Bogdan Marian, Angelica Marinescu, Monica Nădrag, Mădălin-Bogdan Rapan, Alina Stan, Elisabeta Toma,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Corbaciog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編輯顧問: Ana Villarreal.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論作為一位公共社會學家

2

查理週刊

by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Portugal

4

通往公共社會學的兩條路

by Nira Yuval-Davis, UK

7

批判介入的一生：訪談Issa Shivji

by Sabatho Nyamsenda, Tanzania

10

資本主義和氣候正義

by Herbert Docena, Philippines and USA

13

實踐公共社會學

by Ariane Hanemaayer and Christopher J. Schneider, Canada

16

> 非正式環境的抗爭

重新定義城市權利：智利人民運動

by Simón Escoffier, UK

18

烏拉圭的遊民政治

by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Colombia

20

巴西無殼蝸牛工人運動

by Cibeles Rizek and André Dal'Bó, Brazil

22

南非的窮人抗爭

by Prishani Naidoo, South Africa

24

尚比亞：沒有反抗運動的驅逐壓迫

by Singumbe Muyeba, South Africa

26

> 法國工作型態的轉變

創新實驗室和駭客空間：新形成的文化

by Isabelle Berrebi-Hoffmann, Marie-Christine Bureau, and Michel Lallement, France

28

在多元能動的社會中追求性別平等

by Bernard Fusulier, Belgium, and Chantal Nicole-Drancourt, France

30

工作中慢性疾病的協商

by Anne-Marie Waser, Dominique Lhuillier, Frédéric Brugeilles, Pierre Lénel, Guillaume Huez, Joëlle Mezza, and Cathy Hermand, France

32

> 印尼社會學

慶祝印尼的民主

by Lucia Ratih Kusumadewi, Indonesia

34

財團化印尼的教育

by Kamanto Sunarto, Indonesia

36

印尼的勞工運動和工人階級政治

by Hari Nugroho, Indonesia

38

當宗教成為合法的認同

by Antonius Cahyadi, Indonesia

40

在印尼社會向上流動

by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Indonesia

42

> 查理週刊

一些棘手的議題

by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University of Coimbra, Portugal and member of the Program Committee of the 2014 ISA World Congress



圖：各國領袖在Paris聚首。

發生在法國的查理週刊記者被屠殺慘案其實很難讓人真正冷靜下來想想這之中的前因後果。不過分析整起事件還是很重要，因為這有可能會演變成星火燎原，以後可能發生在小孩的學校、家中、甚至其他地方。我以下提出我一些看法。

> 暴力與民主

我們其實很難在因果上把查理週刊的悲劇和美國 911 事件之後的反恐戰爭連結起來。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西方的極端侵略主義已經造成了上千上萬人的死傷，多數是穆斯林。而且，對於年輕穆斯林的懷疑所帶來的暴力和刑求等事件也層出不窮，

>>

從最近美國對國會提出的報告中就可知道這點。而我們也知道許多年輕的穆斯林激進主義者也宣稱其激進行動是來自於那些被低估的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暴力。從這點來看，我們必須停止，並且思考是否這是最適合的減少暴力的政策，因為這帶來的反效果已經太明顯了。而法國對於這次的攻擊事件的回應是去暫停民主、憲法的運作，這預設了對付這種犯罪應該是要以暴制暴而非尋求法律途徑，而且以暴制暴也似乎不違反西方價值。這樣一來，我們可能進入一個內戰的狀態。而在歐洲，什麼國家會這麼做呢？顯然不是西班牙的 Podemos 也不是希臘的 Syriza。

➤ 言論自由

而言論自由本身也是珍貴的商品，可是，言論自由也有其限制。而事實上，多數的限制都是被那些支持無限制自由的人在面對自己的自由被限制的時候所施加給其他人。例如，在英國，若是你批評首相 David Cameron 手上沾滿鮮血，那你很有可能因此坐牢。而法國的女性穆斯林則不準戴 hijab。2008 年，漫畫家 Siné (Maurice Sinet) 因為寫了關於反猶太主義的言論而被查理週刊開除。這些其實都意味著言論其實沒有絕對的自由，而這只是對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標準。以拉丁美洲為例，主要的媒

體都被大公司或大家族壟斷，而媒體也都是第一個喊說不要限制言論自由的人，因為這樣他們才好批評政府幫助窮人的政策。所以，查理週刊當諷刺穆斯林的時候喊說言論要自由，但是許多的漫畫其實也都可以被解讀成助長了恐伊斯蘭症或是席捲歐洲的反移民浪潮。此外，許多漫畫中所描繪的穆斯林先知都是在一些不恰當的文章中所得來的印象，還有極右派的文章。該文描繪了一群懷孕的穆斯林女性為 Boko Haram 組織的性奴隸，而手則放在她們的腹部上，說「把手從我們的社會福利上拿開」。一來，這個漫畫污名化了伊斯蘭，女性，還有福利制度。而多年之後，歐洲最大的穆斯林社群把這個看成是種攻擊。二來，其對巴黎這次慘案的回應則是非常迅速。總之，我們必須要反省那些我們被視為稀鬆平常的普世價值。

➤ 包容和「西方價值」

而這次事件的脈絡則是有兩種意見壟斷了詮釋，這兩種意見沒有一種是有建設性的，無助於一個更包容、多元文化的歐洲。而最極端的表現則就是恐伊斯蘭症和反移民。歐洲的極右派鷹派抬頭，而溫和右派則怕選舉會失利（像是希臘的 Antonis Samaras）。而對於右派思想而言，歐洲文明的敵人就在「我們」之中，這些

人討厭「我們」，這些人拿「我們」的護照，若想要解決文明的危機，那就要把這些人趕走。反移民的訴求再明顯不過了。另外一種想法就是談包容。這些人和「我們」很不同，這些人是負擔，而「我們」卻要因為這些人有用處就包容這些人。「我們」當然可以包容，不過前提是這些人行為守法，內化我們的價值。

但是，什麼是「西方價值」？在許多世紀之後，歐洲歷經了許多以西方價值為名的災難，包括了殖民暴力和世界大戰，我們要思考的就是到底什麼是西方價值。例如，沒有人質疑自由，但是卻沒有人不質疑平等和友愛的，可是這兩個價值卻是戰後歐洲民主與福利的基石。然而最近社會保護也開始被質疑了，社會保護其實是在確保社會整合，但是現在被看成是奢侈的，不論中間偏右或偏左都這麼認為。難道失業，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不是現在社會危機的原因之一嗎？這難道不是助長極端主義的溫床嗎？難道不是族群和宗教的歧視所導致嗎？

➤ 政治信念而非文明的衝突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不是文明衝突，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文明其實來源相同。我們看到其實是政治信念的衝突。歷史告訴了我們政治信仰及其衝

>>

突其實和精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有關。他們從來不考慮普羅階級，但是普羅階級卻是在整個衝突中當先鋒而犧牲。我們會看到在歐洲，那些宗教戰爭和帝國殖民等等，都是例子。而歐洲之外，一向被視為溫和的佛教也正當化了斯里蘭卡的 Tamil 弱勢族群的被屠殺事件。而印度總統 Modi 最近的勝利被視為可能會惡化印度教基本教義派對於 Gujarat 穆斯林的屠殺。而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的迫害也是，甚至伊斯蘭國 (Islamic Emirate) 也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屠殺伊斯蘭教徒。這些是對於無限制世俗主義的維護嗎？還是極端主義的表現？而極端主義反對彼此嗎？彼此有關連嗎？伊斯蘭聖戰士和西方祕密服務有關係嗎？為什麼聖

戰士會被西方視為恐怖主義者，而卻又被視為對抗 Gaddafi 和 Assad 的自由勇士？而伊斯蘭國又如何被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科威特、土耳其所援助？他們是西方的盟友，不是嗎？這就是說，實際上在過去十年間，那些政治信仰衝突下的犧牲者其實都是那些沒有政治信仰的穆斯林人口。

➤ 人命的價值

歐洲人在這次事件中所受鬥到的衝擊和震撼絕對是無比的，也讓我想知道為什麼歐洲人沒有在類似的事件中，譬如無辜死亡的事件，有感受到相同的震撼，也沒有想到和查理週刊可能有關係。就在查理週刊慘案的同一天，葉

門有 37 個年輕人被炸彈殺死。去年夏天，以色列的攻擊造成了 2000 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1500 人是平民，500 人是小孩。墨西哥則是自從 2000 年以來，有 102 名記者被殺害，只因為他們支持出版自由。去年 11 月，在 Ayotzinapa 就有 43 人被殺害。當然，沒有人會說歐洲白人，基督教徒的命比較珍貴，比非歐洲人和有色人種珍貴，可是為什麼被忽略了？只因為大家不熟悉嗎？另外，基督教友愛鄰居的教義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呢？而媒體和政治領導者又怎麼把整建事件自然化，看成好像是他們自己自作自受呢？■

來信寄給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bsantos@ces.uc.pt>

> 邁向公共社會學的兩條路

by Nira Yuval-Davis,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UK, President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Racism, Nationalism and Ethnic Relations (RC05), 2002-6 and member of the Program Committee for ISA World Congress in Durban, 2006



Nira Yuval-Davis是以以色列的異議人士，長期以來為人權發聲。他也是Women Against Fundamentalism的創始人之一，並且也是Women in Militarized Conflict Zones的會員。後者是一個聯合國的諮詢機構，同時也是許多NGO的諮詢機構，像是Amnesty International。她對於性別、種族主義、宗教基本教義派等的研究在國際上享譽盛名，著作包括了Racialized Boundaries, Gender and Nation,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Women against Fundamentalism。她同時也是East London大學的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Refugees and Belonging的執行長。這篇文章中，她將會和Kimmerling對話，討論公共社會學的兩條路。

Baruch Kimmerling 是 1948 年後從羅馬尼亞逃到以色列的難民，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也是公共知識分子。

Baruch 和我是朋友，我們從大學時代就認識，並且同在 Hebrew 大學就讀。Baruch 現在則還在那邊。後來我則去唸碩士，那時是 1969 年，我到了美國，後來又到了英國。其實我們當研究生的時候，都反對 Shmuel Eisenstadt（以色列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但是我們的方法取徑並不同，政治立場也不一樣。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很反對非猶太復國主義或是反猶太復國主意的方式去研究以色列國家和社會。許多年之後，因為我研究了以巴衝突與社會，Baruch 和我有不一樣的結論，而他還是認為自己的復國主義者。他發展了許多重要的理論，而我則走上研究認同歸屬的政治。

2007 年 Baruch 死了，我則是被邀請去紀念會上發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國際學者之一。我說了有關以色列存有的焦慮，這也是 Baruch 稱的 Akhusalim，就是 Ashkenazi, Secular and Labor Zionists，他們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非常主導。我把這個存有焦慮連結到許多廣泛的因素，有些和所有的霸權弱勢團體相似，特別是在殖民地地區。其他則和新自由主義風險社會一樣。還有和以色列社會永久戰爭狀態有關的，以及正在出現的猶太基本教義派，侵蝕到了以色列的這個半世俗政權。

我很驚訝的是，我說的居然有接收到很正面的回饋，這很之前的經驗很不相同。（然而，雖然激進的訊息已經被講者傳遞出去，而會議時候也沒有受到挑戰，我的論文還沒被出版，而且經過了 5 年才出版，這顯然就是會議主辦單位 Van Leer Institute 的抗拒所導致。）

我想要特別推薦 Baruch 的自傳 (1)。這個自傳充滿了智慧和誠信，而且會幫助讀者了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可是，這自傳也帶出了幾個問題。我想討論的有兩個。

► 公共和專業社會學

Baruch 論證說他把他的公共行動和專業領域切割開來，也就是韋伯的傳統，Donna Haraway 所稱的「上帝可以窺見任何事物」。相反的，我則認為知識和想像是有脈絡的，也就是女性主義立場論和其他幾近的學派像是馬克思主義和反種族主義。我不是站在相對主義的立場，而是認為知識的判斷有其脈絡，並不能一概而論和比較。而個人的立場（包括社會地點、認同、規範、價值、經驗、實做、流動的、結構的、過程的）都會影響我們看世界的方式。知識只能從辯證和建構的過程中被逼近，我的很多觀察也都是在特定時空下進行的。

我對於 Baruch 二分政治和專業的問題並不只是認識論上的。透過我的社會學生涯和社運經驗，我發現這個二分法其實是讓兩者都可以學習到對方的精神，學術研究可以讓運動者更了解社會結構的來龍去脈，而運動者也可以得到學者更多同情和關懷的眼神。再者，其實做研究的時候，這條界線是模糊的，因為你真的很難實際上切割開來。

Baruch 的公共介入顯示了重疊的圖像，而切互惠彼此。從他開始決定研究以巴衝突的時候，也就是 1969 年咖啡廳爆炸案之後，其實就重疊了。我很懷疑 Baruch 所宣稱的他在學術著作中對於制度的依賴會少於政治作品。Baruch 自己也說到了 Kuhn 的理論，一旦典範變了，資料收集就會完全變了。可是，當他說大家只讀他短的評論文章而感到氣餒時，我是同情他的氣餒的。

Baruch 的知識典範轉變 和他對於以巴社會的理解讓我們有了第二個疑問。這是因為 Baruch 宣稱這個位置是「中心的邊陲」，是他公共社會學裡的一個預設，也是模型。

► 公共社會學中社會位置的角色

Baruch 用完整，反身，誠實的態度去描述他在以色列最歷史悠久的報紙 Ha' aretz 的第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批判了 Sabri Jiris 的書：The Arabs in Israel。後來，Baruch 了解到 Sabri 其實是對的，也因為沒有可以取得歷史資料的管道，他對於以色列政府的能力是有所低估了。Baruch 承認這也發生在批判 Ian Lustick 的書 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他後來其實對這本書相當讚賞。（雖然他在自傳中沒以提及，可是當我編輯的書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出版於 1975 年時，他告訴我最好不要把它加到 CV 中，以免惹麻煩。那本書包括我在內的很多文章其實都和 Baruch 晚期立場接近。）



Baruch Kimmerling 出生於 1939 年，母親是匈牙利人，父親是羅馬尼亞人。而在逃離猶太屠殺之後，他們全家移民到以色列，並在那邊長大成人。他在 Hebrew

大學讀社會學，而且終其一生。而後來 1969 年大學的咖啡廳爆炸案發生後，他轉向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的歷史與根源，並發展出了和以色列官方不一樣的論述。而作為一個批判政府的知識分子，他受到很大的指控。透過教學和寫作，他企圖要影響以色列的公眾，支持更民主的制度和更公平的社會，取消軍事侵略，並且追求和平和人道主義。Baruch Kimmerling 死於 2007 年，一生堅持理念，擔憂以色列的未來。其著作包括 Zionism and Territory: The Socio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Zionist Politics (1983), The Invention and Decline of Israeliness: State, Culture and Military in Israel (2001); Politicide: Sharon's War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2003)。

而過去幾年來，Baruch 可以去重新評估他對於以巴社會衝突的理解是否適當。他後來變成成功的公共社會學家，作品非常有影響力。我對於事物的看法與理解其實一直在變，我希望像 Baruch 一樣，將會可以堅持己見。可是我想要討論 Baruch 的兩個主張。

第一，Baruch 認為他新發展的觀念和見解非常獨到，沒有受到什麼其他人的影響，也沒有受到辯論影響。這樣非辯證的理論建構，包括自我和知識，其實似乎沒有完全體現了知識和態度形成的過程。諷刺的是，這也侵蝕了公共社會學的基礎，因為公共社會學強調另外的分析和事實呈現。

第二，Baruch 認為他可以變成一個公共社會學家，因為不像我們其他人在邊陲，他其實被認為是「自己人」。換句話說，他是有正當行的批判知識分子，政治精英肯任他。Baruch 認為這個可以讓他在主流的以色列媒體之中，而其他的社會主義者或是反猶主義者則很難發表在主流媒體上。這樣的正當行，他認為是一個公共社會學家的有效管道。

Baruch 見計這個偶然性的接受是來自於其對於 Jiris 和 Lustick 的批判。這是對於其分析的否定，並且後來也得到了認可。但是這個觀點讓我們有了一個主要理論、政治的難題：一個人一定要在累積了一定的影響力之前，去證明自己在這個社會的正當行嗎？而若是這個過程當中讓批判力道減弱了呢？(2)

對於這個問題很難有個簡單的答案。給定現在的以色列政治與社會情況，加上其他地區的狀況，我時常覺得絕望，即使我想要像 Gramsci 一樣產生希望，樂觀，但都很難。雖然 Baruch 從中心開始，不是從邊陲出法，他感到氣餒和沮喪是常有的。我想我很願意聽聽看讀者怎麼看待公共社會學，怎麼看待公共知識分子，以及怎麼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來信寄給 Nira Yuval-Davis <n.yuval-davis@uel.ac.uk>

> 批判介入的一生

訪談Issa Shivji



| Issa Shivji.

Issa Shivji 是非洲一位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原本是在 Dar es Salaam 大學主修法律 (1967-1970)，後來和 Giovanni Arrighi,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 John Saul 等學者，成為了左派學者。這些學者來自世界各地，成為了一股知識分子的大學代表。而當時 Shivji 是個年輕的學生，但是後來挑戰了坦尚尼亞第一任總統 Julius Nyerere 的 Ujamaa 政權的社會主義政策，而在這個早期的時代，他寫許多書，像是廣被討論的 *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著重那些後殖民時

代在政治上沒有代表權的人民。而後來他從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和 Dar es Salaam 大學拿到學位之後，他在法律系取得教職，一直到 2006 年。這段期間，他成為了訴求土地改革和憲法改革的公共人物，而後來雖然政治很動盪，並且他一直批判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和大學財團化，他還是倖免於難。2008 年他被授予了泛非洲研究中心的 Mwalimu Nyerere 主任，試圖讓大學成為辯論的場域。總之，Shivji 啟發了很多年輕學子，也積極參與 ISA 在南非 (2006) Durban 的世界大會。

>>

與大學的企業集團化。

SN: 你和 Dar es Salaam 大學 (稱作 Mlimani 或是 Hill) 的關係始於 1967 年，那時你是法律系學生，然後畢業後你加入了該校的法律系教職。那是你擔任了 36 年的職位。我想問的是，為什麼你一直留在大學，然而你的進步同事們選擇加入其他的機構呢？

IS: 是的，我的許多戰友都加入了其他的機構，包括了國家公職，政黨，或是軍隊。這聽起來或許直覺，可是事實上這是一個集體的決定，看誰在哪個職位上會比較有幫助。戰友同志們認為我應該在大學，我也同意，因為我可以從事進步的知識和意識形態的工作。

而大學也提供了相對多的空間讓我從事進步批判的工作，那也是一個讓批判知識分子可以保持創意與活力的場域。那時候，民族主義的信念和對於帝國主義的理解讓許多年輕激進的學者發展出許多思想，許多人成為高中的教師，讓批判的思想得以延續。我從來沒有後悔擔認這個職務。

SN: 在你的 Accumulation in an African Periphery 一書中，你把非洲和坦尚尼亞後殖民經驗區分成 3 個階段：民族主義 (1960 和 1970 年代)，批判時期 (1980 年代)，以及新自由主義 (1990 年代至今)，這些轉變如何影響了 Mlimani？

IS: 大學存在於社會之中，也受社會影響。80 年代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時期，特別對於非洲來說是如此。那時候大學沒有資源，並且被新自由主義所綁架。我們許多同事都到了南非去，像是萊索托、博茨瓦納、史瓦濟蘭、納米比亞等國。

但是有些人留下來了。包括許多激進年輕的學者，注入許多進步的思想，特別是在革命民族主義年代的頭 20 年內。他們繼續生產好得東西，例如，他們開啟了一場很棒的憲法辯論 (1983-4)，討論反威權和反國家的戰略。當然，每個人的企圖不同，那些把自由民主、人權、多黨等視為終極目標的會要求改革。可是那些民主抗爭人士會要求階級的獨立行動。他們稱為革命的改革。一個例子是改革派會要求立即的制度改造，而革命派會要求先分離政黨和國家，然後開啟辯論，讓人民達成共識而後行動。

在這個轉變下，從民族主義到新自由主義時代，該大學仍然是意是型態和鬥爭的中心，抵抗了第三階段了新自由主義鞏固和國家

SN: 2008 年，你被任命為泛非洲研究中心的 Mwalimu Nyerere 主任 (Kigoda 在 Kiswahili)，是第一位，而後來你也說「讓 Nyerere 的遺產可以持續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你所說的遺產是什麼？因為你曾經說過 Nyerere 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反對由下而上的鬥爭。

IS: Nyerere 是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他是一個進步的泛非洲和反帝的人。可以確定的是，其反帝主義不是以激進政治經濟學為基礎，像是 Nkrumah 那樣，而是其支持人民的持續性。

若和其他的新自由主義學者比較，他對混亂、壓制進步聲音，甚至馬克思主義者的行為，讓激進人士不願去回憶 Nyerere 的遺產是如何對抗資本主義的。

Nyerere 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也沒有假裝過。馬克思自己遇到膚淺馬克思主義時也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而作為領導者，他的確站在抗爭的對立面。不過這不代表那些激進人士不該參考 Nyerere 的遺產，並且從中學習。我的朋友，馬克思主義不純潔啊，是很政治的！

SN: 你所說的 Nyerere 影響的「矛盾性格」是什麼意思？

IS: 我想我不能做得比 Mwalimu 還要好。他把學生因為對抗國家而遊行抗議當掉趕出大學之後的幾個月之後 (1978)，他造訪了這個大學。一個學生很勇敢地問了一些問題：

「Mwalimu，你相信民主，可是當我們抗議的時候你卻叫警察來打我們！」

Mwalimu 看著這個學生，回答：「你想期待什麼？我是這個機構的頭，有使用合法暴力的權力。若你惹事生非，我當然會叫警察。但是你就要停止爭取民主嗎？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原文節錄)

SN: 伊朗革命知識分子 Ali Shariati 曾經稱大學是「堅強的堡壘」，用來提供公司企業所需要的知識勞動力。而 Kigoda 作為一個泛非洲研究的機構，會要去打開 Mlimani 這樣的堡壘的門嗎？有連結知識分子和群眾嗎？若有的話，可否描述一下如何做到的？

IS: 我想若我說 Kigoda 要開放大學的堡壘，那會有點蠢。用阿圖賽的話來說，大學是意識形態機器的一部分，而主流知識分子是生產這些主導知識的生產者和傳遞者，這形成

>>

了所謂主導意識形態。

但是知識生產的過程本質上來說是各種想法的衝突。這讓許知識比較多元。然而，這樣的空間不應該被視為理所當然。這有限制，而且有的時候這個空間是被壓制的。這個一個鬥爭的過程，去開啟進步的空間。就像其他鬥爭一樣，這些知識分子努力去想像知識的方法和型態。

這就是 Kigoda 想要做的。或許這讓一些知識分子有些瘋狂，或許是想要得到一些聲望，或許是要讓整個大學更加進步。總是，雖然有限制，但是那些限制開始慢慢減少了。

人們只可以在給定的環境下作這些事情，我想 E.H. Carr 在 Plekhanov 之後和

我們希望可以今年開始。我個人希望這個中心可以成為這個國家和這個大陸的思想中心。

我感覺新自由主義，非營利主義，諮詢文化等，以及對於政策的注重，這樣重視行動，而較為忽視思想的方式，讓知識犧牲了。而結果就是對於世界分析的淺薄。我們不可能對於世界沒有瞭解就行動。所以，我們必須要有更長遠的史觀。希望這個中心可以點燃這樣整體、長遠的思考。

來信寄給 Sabatho Nyamsenda <sany7th@yahoo.com> and Issa Shivji <issashivji@gmail.com>

SN: Nyerere 曾經警告使用金錢作為武器的後果。然而，資金顯然成為了知識主要的支持。沒有研究可以不花錢就可以執行的。甚至很進步的組織也都發現要抗拒資本主義，很難。那 Kigoda 的運作情況如何？

IS: 是的，錢對知識生產來說變得越來越重要。Kigoda 毫無疑問的有資金的問題，但是其也有一定的規則。第一，所有的管理支出，包括薪水、人事費，會從大學預算中來。第二，Kigoda 會避免接受外國的資金。第三，不論資金的來源為何，都不能有附帶條件。最後，任何議程和活動會嚴格受到檢視。

這並不容易，特別是要把預算控制下來，這需要許多自願的工作和勤奮的努力。

SN: 既然你已經退休了，那麼接下來有什麼計畫？

IS: 再我還在大學裡面的時候，我和其他兩位教授 Saida Yahya-Othman 和 Ng' wanza Kamata 有個計畫，是去寫 Mwalimu Nyerere 的傳記，這個計畫由我國的科技與科學委員會所資助的。我們差不多完成了，所以接下來要開始寫作。

一個重要的結果就是 Nyerere Resource Centre (NRC) 的成立。這個中心會有一個檔案室，而所有的資料都會保存起來，並且讓研究者使用。在中心的周圍我們會舉辦活動，並且提供思想交流的平台、辯論、討論的媒介。

> 資本主義和 氣候正義

by Herbert Doce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and member of the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Labor Movements (RC44)



圖：由「改變系統而非氣候」社運組織所帶領的人民對抗氣候變遷的遊行運動。
Herbert Docena攝影。

從1972年以來聯合國的環境會議在Stockholm召開以來，這已經成為了傳統。2014年的人員高峰會則是另外一種會議形式，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人都齊聚一堂。這些人在秘魯的Lima的街道上遊行，因為有數百名的世界各國代表在一處的軍事營區內開會，而該會議就是聯合國的氣候變遷會議的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

而「人員高峰會」的訴求則有很多，有些人揮舞彩色的布條，說「我們要求嚴肅的氣候變遷法律」或是「不要多說，做就是了！」。這些要求說明了他們認為聯合國會議和場外抗議的人士之間會有可能達到某種共

識，而且那個在14公里之外開會得人可能會在現有的架構下制定出嚴肅的氣候變遷法案。

但是，我們更長聽到的訴求是「改變這個架構，而不是氣候！」的確，這樣的旗幟其實也看得到，例如像是「把地球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或是其他的宣稱，像是「資本家是兇手」或是「COP是掠奪者！」這些宣稱指出了這裡在要求和實際之間有一個很根本的衝突。

這樣要求「系統性改變」的作法已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使用過了，例如，在New York去年9月的大遊行，以及Warsaw在2013年舉辦氣候高峰會的時候，

以及在2010年Cochabamba的出乎意料的世界社會氣候變遷運動，甚至在玻利維亞的聯合國高峰會出現的社會主義者President Evo Morales。

在Lima，有一個很重要的，我們發現了只要在聯合國會議舉辦的地點，你會看見越來越多的警力去維持秩序。但是在Lima之外，警力的增加也反應了更大的一個趨勢，那就是人民的覺醒和認同是全球性的，而且有更深一層的社會力量與全球生態浩劫的平衡在。而這也顯示了全球統治集團鬆動的跡象，他們可能力量正在減少，也就是說，其可以制定規則和討論語言的能力正在減少，越來越不可能影響

>>

人們的輿論與意見。

畢竟，自從 1970 年代開始，不同的團體、政府、公司、知識分子等等已經積極的在運做了，雖然有時手段不一，並且也有競爭關係，可是他們都有想要改變這個讓人無法置信且不民主的系統。他們已經試圖要去解釋和宣傳全球統治集團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的不當，並且人民才是有能力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行動者。

而突然之間，後來出現了激進的環境主義運動，他們譴責資本主義，全球生態問題，並且譴責霸權和所謂全球一致的利益。他們被迫要投身被分析家所忽略的「全球環境變遷」戰場中，抗議官方所代表和所理解這個改變的作法與觀點。

透過 OECD、世界銀行、聯合國等知識生產的架構，加上 NGO 和其他公民社團的抗爭，未來 20 年所有解決的問題，和激進環境主義者不同的是，會是我們常見的標語像是「永續發展」，「生態現代化」等等，譴責生態危機和市場失靈，或是譴責石油工業。這些都沒有觸及整個系統結構性的問題。因為他們還是把資本視為有用的，好得，是可以結盟的。夠過每天制度化的實做，不論從計算碳排放到處罰，他們已經慢慢的讓人們熟悉這些概念，告訴大家其實敵人不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才是。

總之，全球的統治精英已經試圖要去建造一種類似的文化好讓人們相信上述這些都是很平常的知識，而只要是反對的聲音就是太過於激進和有敵意的。而在很大的成度上，他們成功了。而

最激進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是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那些要求系統變遷的人已經被視為是極端分子。沒錯，現在要想像世界末日其實比想像系統變遷還要容易多了。

然而，不論在 Lima 或是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的人，包括知名作家 Naomi Klein，教宗，其他人等等，都明白表示氣候變遷和資本主義有關，並且把資本家看成是掠奪者。這都指出了其實資本主義霸權還是有裂縫，使得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得以展開。

可是，目前為止，Lima 的聯合國會議顯示了，這個運動並沒有那麼強大，強大到足以抗衡世界上的統治集團。

因為他們否認氣候危機其實根源在資本主義這樣的說法。那些有遠見的企業主也都這樣認為，不覺得有危機，甚至反對任何改革。資本主義的先鋒們想要控制全球經濟，並在 OECD，世界銀行，大學，政策部門等等都發揮影響力。他們已經有在討論怎麼改變系統了，但是作法就是不要改變。

而被生態危機所威脅和激進運動所影響的統治階級知識精英在過去 30 年來已經開始探討和辯論怎麼去從事類似的全球環境管理和管制資本主義。

而過去 5 年，許多來自發展國家的人已經使用了相同的模式：生態現代化，並透過全球新自由主義管制。要求 1) 制定規範，讓所有的政府都可以約束去減少碳排放，但最終讓政府自己去決定是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去實行。2) 使用市場機制，像是碳交易、稅收

等等，企圖去把碳的價格提高，讓整個資本主義可以轉型到低碳的階段，並投資和使用科技去讓事情得到解決。

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方法的支持者並沒有得到全球統治精英的一致認可。有來自南方的反對聲音出現。這是因為他們為了可以保護自己的統治利益，這必須要北方精英的支持，所以我們並沒有看到南方政府有太多的反對，反對生態現代化而只持社會民主方案。在這個解決方案中，世界上的國家就是制定出碳排放的上限，然後透過全球重分配的機制，迫使政府可以減少排放量，並且改變發展中國家，而不是完全透過市場機制。

但是內部的弱點和矛盾使得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每一年都無法或是不願去抵抗市場的解決方案，無法跟已開發國家說不，所以沒有自主性。對於那些反對已開發方案的人而言，協商過程中，許多全球南方的統治階級也同意了，就是改變系統等於維持現狀。

而結果就是那些發展國家的官方已經運作要去建立新的氣候變遷的架構，並且明年在 Paris 簽署，於 2020 年生效。這就是全球新自由主義管制。可是這個同意架構不可能改變和減少碳排放，並且提供資源改變生態。我們因此需要新的架構，好讓我們可以進步才對。

但是，是有希望的。畢竟，統治階級的能力是有賴於繼續打壓反抗聲浪的持續性。這個就會需要其他人去推廣一個普世的利益，而且要可以解決危機，並且在現



圖：在Lima的示威遊行是規模最大的一次。Herbert Docena攝影。

有系統下達成。這些都不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因為他們要犧牲。這樣的失敗只會讓除魅更加嚴重，激起憤怒和焦慮，而我們已經看到溫和的環境主義者加入出走聯合國環境會議的行動，並起接受 72 年的結論，認為那些穿西裝的沒有辦法達成什麼嚴肅的氣候法案。

但是是否這個明目張膽的霸權危機會把這樣的運動轉譯到有辦法結合其他社會力量上，進而對抗那些精英對於氣候變遷的不作為呢？使否除魅和焦慮會轉變成積極的抵抗呢？這我們不清楚。很大程度上，這依賴於有能力去協商，去調和這個長期的緊張關係，也就是再納入人民聲音的目標和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兩個目標從來就不是一致的，因為要形成一個更廣大的聯合陣線，製造壓力給那些人，並且批判打倒意識形態和理所當然的知識，我們用的語言卻是增加而非批判那些統治理念。若沒有去轉變那些理所當然的語言，即使有在廣大的聯合運動，也沒辦法撼

動，只會讓資本主義更加鞏固。

所需要的策略是要能讓公眾加入並且不能減少對於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觀的批判。這樣可以讓人民去自主改變系統。這會需要一個「大遊行」，並且是在 Paris 的聯合國會議之後，然後拒絕「人民」是依賴全球統治精英的世界觀的。這樣一來，還需要不斷質疑聽起來很進步的那些解決方案，那些認為危機是由國家而非階級所造成的，像是所謂的碳預算。再者，我們甚至要那些進步、社會主義的政府去擁抱非石油的經濟結構。

若要成功把「改變資本主義」放到議程上，那麼就要讓清楚說明什麼是另外的具體替代方案。■

來信寄給 Herbert Docena
<herbertdocena@gmail.com>

> 實踐公共社會學

by Ariane Hanemaayer,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and Christopher J. Schneider,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Canada



圖：Ariane Hanemaayer和Christopher Schneider實驗公共社會學的實做。Ariane Hanemaayer攝影。

公共社會學的前提是要投入公眾並與之對話，達到相互教育的目的。而有許多有趣的方式可以實做公共社會學。在這篇短文裡面，我將要探討兩個實做的方式（數位的例子請見ISA的Public Sociology, Live! 或是在Hanemaayer and Schneider, The Public Sociology Debate的e-public sociology）。第一個實做的方式包括了發展一個社會學家的咖啡館，稱之為週日社會學家。從這裡則有了第二個實做的方式，是類似大學課程版本的週日社會學家，是咖啡店，或稱為一毛錢大學，也就是說學費只

要一毛錢。這已經成為重要的社會管道，而對話與交流則在公眾間進行，包括學生、店家、知識分子。

2009年我們發起了週日社會學家 (www.sunday-sociologist.com)，這是從一毛大學所啟發而來的點子，希望可以把個體帶進來，因為個人有著各種不同的角度與視野。我們邀請社區成員、大學教授、學生等一個越來一次，來到咖啡館 (Kelowna, 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 去辯論各種重要的議題 (國家新聞、影片、政治等等)。目的是要相互的教育，不論是在地或是全球的議

>>

題都行。而對話總是刺激許多激烈的辯論，慢慢的也會凝聚、形成意見，社會學家的引導下，可以把個人煩惱和社會議題結合起來。

我們選擇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的下午舉辦。這個安排反應了我們審慎的希望上班族可以加入。我們也在免費的網站上打廣告。而每個月的聚會也要各種人的參加，包括大學、高中學生、退休人士等等，還有一位叫做 Brendan 的「吸塵器銷售員」和「一般人」。

雖然我們的社會學家咖啡是因為星期日而命名之的，我們希望強調，不論工作或生活、政治或社會，我們都在思考社會學問題。不像是專業的話學家，公眾的生活是社會形塑之或是生活形塑社會。而社會學的想像已經存在了，若是社會學想像可以激發我們週日的討論，那麼其實這樣的方式就證明是非常有用的。

週日社會學家也啟發了一門大學贊助的課程，還有課程大綱。這個用意是去邀請公眾的成員去上社會學的課。每週會邀請一位社會學家來上課，以公眾可以接受的方式進行，然後進行一個小時的小組討論，學生人數最多 30 人。而課程和每一位講師都會透過大學而進行廣告，或是利用社群媒體，而每週都會有 100 人左右參加。社會學學生和公眾會打散到各個小組，好進行對話。然後會和講師和助教一起合作討論，激發大家的社會學想像。

有不少會固定參加週日社會學的人。大家的反應都很熱情！例如，吸塵器銷售員 Brendan 說：「有辦法可以參加這個討論和感到有趣，並且有所貢獻，那是我最大的動力來源，我從會有過這種經驗！」另外一個人說：「這種課程實在是個特權啊，我很榮幸可以參加，我都快 80 歲了，很高興可以跟年輕人討論議題！」

這些反應促使了我們要更進一步思考我的社會學的信念和專業。有一個最常見的兩難就是我們常常需要把複雜的社會學概念講得清楚和明白。我覺得在我的專業之外，這也是我要努力的地方。這是一個絕佳的公共教育經驗。那裡有許多公共的支持，我們也覺得有受到鼓勵去發現更新更有創意的公眾介入方式。廣大的脈絡是非常有助益的。

Kelowna 是一個富裕的退休人員社區，是 British Columbia 很好的居住地。許多參與週日

社會學家和公共社會學課程的公眾都是退休人員，有大學學位。例如，Joyce 是一個規律的參加者，說道：「我大學修過社會學，那在 70 和 80 年代，我都忘了是什麼樣子了，這個機會重新點燃了我對社會學的熱情！」此外，若是類似的形式舉行在勞工階級的社區，那想必挑戰會很大。我們這樣的課程是預設多數人有電腦、網路，而且平常有關新時事，收聽廣播，而有點左傾，對於公共事物有興趣！社會學家們若希望舉辦類似的課程，那麼可能要考慮各種其他的人口結構組成因素，並把在地的脈絡也納入考量。■

來信寄給 Ariane Hanemaayer <ahanemaa@ualberta.ca>
and Christopher J. Schneider <cschneider@wlu.ca>

> 重新奪回都市

智利的社會運動

by Simón Escoffier, Oxford University, UK



圖：在Santiago的 Villa Francia一處爭議性社區。「組織起來反抗，贏得勝利」。由 Nathalie Vuillemin攝影。

儘管智利有很長的社會運動的歷史，可是自從 1990 年以來，都市貧窮問題被理解成是一群被社會隔離的人在政治上很被動。我的研究是著重在 Santiago 的 Peñalolén 地區，而我想要論證的是，至少在我的案例中，都市貧窮人可以組織動員，並反抗政府的政策。

David Harvey (2008: 23) 定義都市權利為「透過改變都市而改變自己的權利」。若把都市化和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從學術上來看人民的財產權，Harvey 認為人類應該要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去重新形塑都市化的過程。對於貧窮社群來說，執行都市權利包括保衛都市居住權，並且可以使用設施和資源，抵抗都市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化。

主流的學術解釋是說，透過持續的集體動

員，智利都市貧窮已經得到了都市權，不過雖然有些時候比其他時候來的成功。住宅集體行動則可追溯到 1920 年代。和政黨以及其他機構聯合，所謂的「居住者運動」(1) 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他們對政府施壓爭取權利。在 1957 和 1970 年之間，土地佔領變得越來越多，重新改變的智利的都市形貌，特別是 Santiago。事實上，1972 年的時候，也就是 Allende 的政權，16.6% 的人口居住在非正式住宅區 (Santa María, 1973: 105)。

那些非正式住宅區是左派團體的地區，所以許多住宅區因此被軍政府鎮壓 (1973-1989)。許多地方的草根抵抗很持久，也是對抗威權體制的重要力量。

1990 年之後，當智利民主化以後，居住者運動的研究消失在學術圈了。雖然許多研究中

心研究 1980 年代的集體動員，像是 University of Chile, PUC, CIDU, SUR, Flacso,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等等，但是在 1990 年代，學術界開始關係去動員化，而非集體行動。他們把那些非正式地區描述為非法活動的溫床，毒品和其他問題叢生的地方 (Hipsher, 1996; Tironi, 2003)。

Santiago 的東部 Peñalolén 地帶，就像其他的智利都市一樣，提供了反例。事實上，Peñalolén 的社區已經系統化地進行了集體動員超過 25 年，訴求的不只是權利，還包括更積極的改變都市。

無殼蝸牛人民組織要求居住權利，而有 900 戶的移入家庭從 Peñalolén 的各地而來，佔領了高房價地土地，主要在東部。在 1992 的冬天，Esperanza Andina 成立，這是第一個智利民主政府的土地佔領，透過很強的社群組織，拒絕政黨和政府的收編，Esperanza Andina 要求在都市地區建造社會住宅。而許多年的抗爭、衝突、協商之後，居住者得到了土地權，合法化了社區，並且取得了蓋房子的許可。

而 1999 年的 7 月，持續的住宅需求和居住者拒絕搬遷到都市外圍的抗爭導致了 Peñalolén 另外一波的土地佔領運動。有名的「Toma de Peñalolén」是最大的佔領行動，包括了 1800 戶家庭，該行動施壓政府去提供社會住宅。雖然 Toma 的組織後來分裂了，排除了激進組織加入協商，多數人最後還是取得居住權。

Peñalolén 對於社會住宅的抗爭一直持續到今天。事實上，從 2006 年開始，左派草根的無殼蝸牛抗爭運動 (MPL) 已經協調了地方的住宅委員會，要求社會住宅的權利。

Peñalolén 的事件已經顯示了社會住宅的抗爭運動可以是都市貧窮人口取得權利的方式之一。而 2009 年的居民草根組織也知道新的都市更新計畫要實施了。改變了土地管制措施允許建築物建造，包括了新的道路，讓交通更方便，並新引新的店家進駐。而新的計畫目的是要去使土地價格上漲。此外，這個計畫並不包括足夠的土地去滿足住宅的需求，雖然有些社區認為這樣的計畫很好，但是多數的草根團體拒絕這種縉紳化的政策。那些團體抗議新的政策，要求公民投票表決。2011 年的 12 月底，這個計畫被投票否決了。這保護了該區域，貧窮人家得以保留居住地，畢竟他們已經住在那邊 30-40 年了。

Peñalolén 的東部地區稱作 Lo Hermida，已經在過去 25 年來發展了很強的集體動員文化。而利用這樣的集體社群價值和認同，這些地區開展出了不同的方式去重新整合地方，因為在過去這些地方是被其他勢利所收編的。例如，

居民組織了音樂工作坊，或是其他活動，作為重新奪回這些地區的方式。

Peñalolén 歷史地聚集了集體的事件，這回應了許多其他智利都市貧窮的問題，以其怎麼取得城市權利 (Sugranyes, 2010)。這樣的過程顯示了智利都市的貧窮群體是有能動性去變得有影響力，進而集體行動，爭取權利。■

來信寄給 Simón Escoffier <simon.escoffier@sant.ox.ac.uk>

References

Harvey, D. (2008)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53: 23-40. Retrieved from <http://newleftreview.org/II/53/david-harvey-the-right-to-the-city>.

Hipsher, P. (1996)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in Chile and Sp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8(3): 273-297.

Santa María, I. (1973) "El desarrollo urbano mediante los 'asentamientos espontáneos': El caso de los 'campamentos' chilenos." *EURE* 3(7): 103-112.

Sugranyes, A. (2010) "Villa Los Condores, Temuco, Chile Against Eviction and for The Right to the City", pp. 145-148 in A. Sugranyes and C. Mathivet (eds.) *Cities for All Proposals and Experiences towards the Right to the City*. Santiago de Chile: Habitat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HIC).

Tironi, M. (2003) *Nueva Pobreza Urbana, Vivienda y Capital Social en Santiago de Chile, 1985-2001*. Revista de Sociología. Santiago: Predes Editores.

> 烏拉圭的非法住宅的政治

by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Universidad del Rosario, Bogotá, Colombia and Board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Region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RC21)



圖：在Montevideo 的非法住宅區越來越多。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攝影。

過去 20 多年，Montevideo 改變了很多，而在新自由主義和民主化的影響下，烏拉圭的首都也越來越不平和隔離，或許最明顯的就是非正式住宅區的增加。

Montevideo 的非法居住地區在質上和量上都有很大的轉變。非法侵佔地區擴張得很快，但是很矛盾的是，他們也漸漸得變成有規劃地侵佔。結構的因素，像是持續的去工業化、財產減少、低工資等，都或許更直接影響了這個轉變。不過，整體圖像還是不完整的，而且我

們沒有好好檢視政治的角色和經濟的轉變，還有民主化和選舉競爭的因素。

雖然許多人認為非法侵佔是出自於個人意願，是經濟因素導致的「自然」結果，但是仔細看看 Montevideo 的案例會發現，組織和政治網絡是有其重要性的，並且為了回應政治機會結構，這個因素相對更加重要。

在拉丁美洲，國家和政治的力量形塑了非法住宅區，也吸引了許多人注意，因為這個關係比以前都來得強。可是 Montevideo 的案例卻

>>

不一樣。雖然土地侵佔 (cantegriles) 在 1940 年代偶有發生，但是烏拉圭的首都有能力吸收了多數的農村移民，特別是在工業化時期。甚至在 1980 年，儘管都市不平等的警鐘已經響起，Montevideo 仍然是相對平等的地方，在經濟和空間上都是如此。

但在 1990 年代，非法居住區開始擴張開來。1999 年，Montevideo 的一半的非法居民是小於 15 歲的，而大約三分之一是從組織性的土地佔領而來。有些事計畫好，甚至有烏托邦的想像，至少一開始的時候，早期的移民的確想要比滿足基本需求更多的東西。大致上來說，從左派領導的觀點，這種非法佔領有著草根土地改革的想像，批判政府的住宅政策。其他的政治人物則也幫助非法移民建設房子，規劃道路和公共設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像是學校，健康中心，合法化等等。非法住宅區或許是最近政治上最熱門的議題，也是烏拉圭窮人的政治行動。這就像 Portes 和 Walton 在他們的 30-40 年前的書 *Urban Latin America* 中所描述的一樣。

這個轉變背後的因素是什麼？這裡的問題特別有趣，因為 Montevideo 還沒有經歷過類似的人口成長，農村移民總是會在各種非正式地區屯墾，但鮮少在都市。許多 Montevideo 的非法移民都是從城市來的，並且被迫移動，特別還在他們組成家庭和失業的時候。租金的漲價也是推力之一。

可是，經濟因素不能解是為什麼有些群體和家庭會決定要去非法侵佔，也不能解是為什麼是在某個特別時間點。例如，為什麼不是在 2002 年的經濟危機時去侵佔呢？政治和選舉中介了這個 Montevideo 新社區的形成和鞏固，特別是在規劃區。烏拉圭獨裁統治的結束和左派聯合陣營 Frente Amplio (Broad Front) 是第三勢力，也有選舉的實力，最後也贏得了 1990 年 Montevideo 的市長選舉。並且擴大了其他陣營對於侵佔區的包容和支持。

許多非法住宅的領導人在 1990 年代和不同政黨的政治人物有連結。雖然多數都堅持「我們在這裡不是政治人物」，但是他們事實上他們卻政治得很。過去的社區領導人或許會和 Colorado 政黨結盟，因為公共工作部長是 Colorado 黨的。可是他們也和 Frente Amplio 黨有良好的關係，也提供了可非法侵佔的資訊，並起同時也試圖在 Blanco 黨的人來訪時要營造好的形象。

然而，很快地，所有城市的居民開始知道什麼是必須的住宅問題解決辦法，或是怎麼讓政黨可以得更多選票，或是怎讓服務的提供可以變貴，而且特別是在之前的非法住宅區。市

政府和政治人物都知道這個問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土地侵佔的事件數目並沒有在 2002 年經濟危機的時候暴增。這也是為什麼總統 Mujica 要在 2011 年公然驅離那些居民。此外，選舉競爭本來想爭取窮人的選票，卻在 2009 年之後左派第二次執政之後，也不再繼續了。

雖然 Montevideo 的土地侵佔或許有點太短了，但是結果卻影響且持續了很久。即使這個國家的經濟有在好轉，asentamientos 還是很貧困，沒有基礎的設施，有很多社會和經濟的問題。貧民窟的改建計畫也擴張到許多地方，可是還是有限制。20 到 25 年或許不能輕易地被取消的，整個世代的小朋友若在這種地區長大，被隔離的經驗還是會有污名，會影響到後來的人生。

然而事情已經開始了。也就是說，公共公園已經被建造在特別的地區，鄰近那些非法居住區。新的住宅計畫也已經開始執行了，免稅讓私人的社會住宅公司有更多的動力去加入計畫。住宅合作社也增多了。可是，讓非法居住區可以納入社會住宅的挑戰仍然存在，也是 Montevideo 要面對的課題。■

來信寄給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majo.alvarez.rivadulla@gmail.com>

> 巴西 無殼蝸牛工人運動

by Cibele Rizek and André Dal'Bó,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Brazil



MTST在São Paulo的大遊行。

巴西的無殼蝸牛工人運動 (MTST) 在 1990 年晚期展開，訴求是聯合「工人、失業者、和百萬無家可歸的巴西人，他們住在危險的房子裡面，在都市的邊緣，沒有安全，也沒有保障。」現在巴西的都市政治非常有活力，而 MTST 也組織了許多抗議活動，讓巴西社會攪動翻滾，而且其動態的組織也提供了政治辯論的一個觀點。

重要的是，這個運動和以往的住屋者運動有很多的不同之處，後者在 1980 年代興起，並

且和政府所領導的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PT) 運動是聯合的。但雖然 MTST 一開始是所謂的無土地運動 (MST)，無殼蝸牛工人運動後來出現，並在 1997 年的國家人民大遊行之中產生。那時後的無土地運動者是從事 Oziel Park 的都市佔領，那在 Campinas，São Paulo 州。第一個 MTST 的佔領運動叫做 Anita Garibaldi，是 5 年後在 Guarulhos 所組織的。

自從第一次的佔領，MTST 已經組織了至少 10 次的佔領活動，包括了 São Paulo and

>>

Campinas, including encampments called Chico Mendes (Taboo da Serra, 2005); João Candido (Itapeceira da Serra, 2007); Frei Tito (Campinas, 2007); Jesus Silverio (Embu das Artes, 2008); Zumbi dos Palmares (Sumaré, 2008); Dandara (Hortolandia and Santo André simultaneously, 2011); and the Novos Pinheirinhos (Santo André and Embu das Artes, 2012)。

2013 年 6 月，巴西歷經了很緊張的抗議過程，這使得長期的人民抗爭連結到了新自由主義政策。這其實並非偶然，MSTs 非常主動活躍，而且每天都和私人開發商產生衝突，也和不動產業者、國家起衝突。此外，長期的街頭抗爭主要發生在 2013 年 6 月和 2014 年 8 月，MTST 的佔領運動包括了廢棄閒置的土地和建築，規模迅速擴大，從 São Paulo 到他的都市地區。而超過 100 場的行動出現在過去 1 年之中，相當驚人。

巴西其實對於住屋的短缺相當頭疼，而且都市的負債也從 2011 到 2012 增加了 10%。有數以千計、萬計的巴西家庭被驅逐，那是因為土地價格的飆漲，房地產和租金的過高，以其房地產市場的暴增。這個房地產的負債使得巴西政府設計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住房計畫，和其他的社會計畫一起，這個計畫叫做 My House My Life (MCMV; Minha Casa Minha Vida)。這讓經濟起飛，製造工作，並且讓低階級可使用以往無法使用的消費和設施。諷刺的是，這些社會住宅也增加了都市的居住隔離和排斥，並沒有幫助巴西的都市中心窮人或是邊緣的那些設施。

在這脈絡下，無殼蝸牛的工人運動就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巴西的都市政策使然，所以運動的快速成長也連結到了政府的社會住宅計畫，而且使得事情更加複雜。工作的協商已經讓運動同時都變成了政策辯論的局內人和局外人。

這個矛盾性可以被看成是最明顯的運動成果之一。一旦 MTST 的職業開啟了協商機會，則市政府會被要求取得被佔領的土地，而且很快地 MTST 可以要求家庭成員的納入社會住宅計畫。可是新的社會住宅或許也會造成隔離，因為新的社會住宅主要給窮人，而且幾乎不可避免地建構在都市邊緣，讓不平等更惡化。

MTST 也發現這個矛盾性。即使運動者是協商者，而建商是政策執行者，街頭的抗爭還是持續進行中，抗議暴力的驅逐、逮捕、甚至傷亡。因此 MTST 運動繼續扮演著把巴西社會政策的隱藏面揭發出來的角色，也就是不正義的都市政策，半吊子的社會計畫，不斷的衝突和抗爭。而且，或許最重要的就是，作為關鍵的巴西社會運動，MTST 體現了希望，體現了巴西都市更平等和公平的未來。■

來信寄給 Cibele Rizek <cibelelr@uol.com.br>

> 南非窮人的抗爭

by Prishani Naidoo,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South Africa



圖：在Soweto的Orlando居民抗議其2010年世界盃的建造計畫所帶來的影響。Nicolas Dieltiens攝影。

南非主導性對於非種族的選舉強調政治制度的成功，政治人物，政策，過程等。然而，非正式政治制度還是不斷地影響著政治，或許最明顯就是抗爭政治。這是在政黨、工會、組織等制度之外產生的，窮人聚集在一起，並且一起行動。

這種非正式場域的政治鬥爭有特別重要之處，因為那些地方其實都是被設計來把黑人隔離起來的地方。這樣的情況，你可以想像成是為了要把黑人永遠囚禁在社會底層，

然後避免他們「製造麻煩」。畢竟，這樣就是為了回應黑人非法在都市中寄居，使得許多政策必須要設計來控制黑人的移動，這就像是廉價勞工的限制移動一樣。這包括了非正式城市的建立。但是也是從這樣的地方產生了反對種族隔離的運動，以及爭取更好生活的反抗。

今天，也就是在20年後正式的廢止種族隔離政策之後，非正式的政治繼續影響著多數南非窮人的生活。其實種族隔離還是存在著。這也是為什麼從1990年之後，至少在每年

冬天（但逐漸變成是一整年），窮人和那些非正式社區的居民會到街上或道路上去抗議，爭取基本的生活條件，包括水、電、基本房子。這已經變成了常態。這是在2000年開始擴張的，然後到了2004年有更大的規模產生。

早在1997年，孤立的類似事件已經產生，是發生在窮人地區，他們抗議他們的住宅沒有水電。而接下來的3年中，這樣的報導變成了更常態，因為窮人社區面臨到的私有化的剝奪權利，以及失業的威脅，還有勞動彈性化的

>>

影響。而這樣的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其實是 ANC 政府在 1996 年的政策。斷水和斷電以及驅逐居住地等事件不斷發生，而都市也要求居民要付費使用這些基本設施。受影響的居民聚集在一起，拒絕這些對待，然後上街抗議。他們的抗議包括了遊行、拒絕政府人員進入社區、毀壞公共財產、私自接上水電等等。這些抗爭開始和其他的社運者聯合，並且把「新自由主義」當作是共同的敵人。

2001 年以前，抗爭運動和批判路線包括了訴求「新社會社區運動」，重要性在於他們是第一個在 1994 年之後的運動，並且是在 ANC 政府的對立。有一本 2002 年出版的非常有影響力的書叫做「We are The Poors」，由社會學家 Ashwin Desai 所說的新的政治主體的誕生，poors 就是在這樣的鬥爭過程中產生了，和學生、知識份子、運動者一起，抵抗 ANC 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化。

而 20004 年，許多這些運動已經進入了下滑階段。國家迫害所累積的影響，組織間的政治角力，以及資源使用的困難，種種因素都讓情況更惡化。在許多案例中，國家對於運動的回應使得運動癱瘓了。可是諷刺的是，2004

年是一個有更大規模抗爭的一年，許多都是之前 2000 年早期時的運動的影響。非正式的政治可能還是會侵入，可是政府的回應已經失敗了。

在許多案例中，一旦居民用盡了所有官方的管道但也沒有下文的時候，抗議者只能被迫走人。在一個案例研究中，名為 The Smoke That Calls，由 Karl Von Holdt et al. 在 2011 年出版，抗議者認為有些時候唯一得到注意的方式就是去把東西燒了，或是燒輪胎，產生煙，好讓政府知道。越來越多這種類似的活動讓媒體越來越常使用「暴力抗議」的字眼。而同時，警察的行動也越來越暴力。2009 年報紙就報導了至少有 43 個抗議者被警察打死。

今日的抗爭也總是被連結到地方結構的差異上面，像是 ANC 和其形成。這個被視為是 ANC 成員的動員運動，是反對其在都市被選出的領導者的。有些結果其實是政府敗退了，有些時候則是批判政府的政策，並且得到資源，像是工作或是補助。接下來若是看看新的政治組織像是經濟自由鬥士 (EFF) 和聯合陣線 (國家鋼鐵工人工會) 怎麼和在地的鬥爭連結起來。

雖然政治人物試圖去

把注意力引導到形式政治的領域，像是國會或是政黨，可是非正式的政治還是持續進行著，並且著重在地方的層次。這是改變的機會所在。然而有很多事情是取決於集體的信念，也就是集體地去想像一個不同的政治。■

來信寄給 Prishani Naidoo
<Prishani.Naidoo@wits.ac.za>

> 尚比亞： 沒有反抗運動的驅逐 壓迫

by Singumbe Muyeba,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outh Africa



圖：當總統在討論驅離政策時，小朋友就站在廢墟中(Chinika, Lusaka)。這是由尚比亞國家軍隊所執行的。Emmanuel Tembo攝影。

2013年4月，15輛武裝的警察車進入了Lusaka West，把居民叫醒，然後趕走。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種事情發生。警察摧毀了33間房子，大約365人無家可歸，他們已經在那邊住了20年了。有些驅逐者甚至是低階的警察。驅逐行動並沒有通知，而Lusaka市政府法法院的核准也沒

有。在驅逐之後，那些高階的警察佔地為己有。在那個月，有更多的人被驅逐。5月15號有被驅逐的家庭走上街頭抗議，走向副總統的辦公室，但是被攔下了，然後被趕走。他們沒有警察的允許，這是公共秩序法的規定。而為什麼這一連串事件沒有導致社會運動的發生呢？以下我試著解答這個問題。

Lusaka West的案例只是許多案例的其一而已。驅逐行動包括了數百的住戶。2014年在Kanyama就有14間房子被摧毀，Chinika則有100間，Mikango Barracks則是許多人被驅逐。而摧毀住宅的政策是針對那些非法民宅而來，這是2007年政府的法令。而Patriotic Front政權從2011年上任至今，

>>

已經驅逐了許多人，特別是 upgraded squatter settlements。而摧毀的過程也並不合法，並且很多案例中，驅逐都有人傷亡，這是嚴重的公共議題。

這個情況對於社會動員來說是很適合的環境，因為有 70% 的都市人口居住再貧民窟，而這個意味著只要有類似的居住地的都很容易就會人口超過。而整個國家也有很長的抗爭歷史和傳統。

但是，我們要怎麼解釋抗爭的缺乏呢？第一，政治精英的不寬容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了，起始於 1955 年的公共秩序法案。這個法案是英國殖民政府所制定的，為了要控制那些反對運動。而後來的總統並沒有取消這個法律。總之，這個法律要求抗議者要提出申請許可。他們只能在抗議的 7 天前申請，而且通常不會被允許。此外，這個法律並沒有承認非法居民的抗議權利，所以即使居民住在某處很久了，不管怎樣抗議都是違法的。

政治精英的不作為並不只是保守而已，他們還害怕沒有被允許的抗爭後果。公共秩序法的違背通

常會導致警察的暴力，並且還會讓那些居民受到驚嚇。例如，Kampasa 於 2013 年 6 月 14 日有一群被驅趕的居民在機場附近抗爭，但是有兩人被射殺，一人受傷。這是國家暴力。我的訪談者 George 也擔心最近的驅逐和歧視會更加嚴重，即使他們有擁有居住的證照也照樣會被迫害。當我問說他們會怎麼辦的時候，他們都說只能放棄，到別處去。

政府和公民社會也沒有辦法保護潛在的被驅趕者，這是因為有限的金錢資源而導致的後果。而居住權力也沒有按照 Mwanawasa 總統所宣稱了那樣在憲法中被明確制定，他那時宣稱政府要確保這個居住權。所以，政府公開地拒絕了補償那些被驅逐者。總之，政府不但沒有提供資源改善居住問題，反而迫害了人民。

公民社會也沒有經濟方面的資源來保護非法居民免於被驅逐。雖然尚比亞有 Land Alliance 和 Homeless International，他們組織了 People's Process on Housing and Poverty，這個組織宣稱主要是對抗驅逐的公權力，但

實際上並非如此。「這些組織常常沒有去動員社區或是處理那些土地爭議，雖然公眾希望他們這麼做，可是資源不夠，沒有辦法繼續下去。」(Zambia Land Alliance, 2014, <http://www.zla.org.zm/?p=9>)。2010 年，對於貪污的控訴讓民眾對於流向政府的補助產生了質疑，讓許多計畫停止了兩年多。所以，這些組織有時候只有做出聲明，但是卻沒有徹底處理。

總之，對於 Lusaka 正在興起的反驅逐運動和尚比亞的新社會運動的主要的兩個挑戰是，第一，對任何形式抗爭的公開敵意。第二，政府能用來解決居住問題的有限的金錢資源。一旦人們開始被驅趕的時候，他們沒有任何的機會，所以抗議也就淪為沒有目的了。只有法律上對於公共秩序的改變，以及經濟的成長可以提供給這些運動繼續茁壯的希望。■

來信寄給 Singumbe Muyebe
<singumbe.muyebe@uct.ac.za>

> 創新實驗室和駭客空間 新形成的文化

by Isabelle Berrebi-Hoffmann, Marie-Christine Bureau, and Michel Lallement, LISE-CNRS,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Paris, France



圖：典型的駭客空間。(Michel Lallement攝影。)

種新的分享形式正在形成中。這也是一種新的合作生產和消費的方式，並且對於現在的經濟型態提出疑問。創新實驗室和駭客空間是特別的一個地方，在這個脈絡下，公共利益所以引發的經濟是以使用而非產權為基礎的。這個集體的製造空間在 2000 年成立，引進了一種新的工作倫理：製造的文化 (maker culture)。這樣的空間有不同的名字，像是創新實驗室，駭客空間，製造空間，生活實驗

>>

室，科技小舖等等。他們是一種重新發現把各種事物放在一起而製造出樂趣的嘗試，寫程式，或是想像新的穿衣或是烹飪型態。全球的大城市都很歡迎這種空間，因為這同時鼓勵了新的生產、合作、消費、學習的形式。

3D 列印機是這種空間的中心，因為它可以讓生產出任何的東西，而且只要透過網路上的設計圖就可以列印了。雖然成品有待改進，但是進步得很快。許多這些的空間也有專業的社會，像是數值控制儀器如雷射剪裁機等等。幾年以前，使用這種設備需要數個月的時間的訓練，可是現在只要數個小時就可以。此外，機器的價格和設計軟體的價格跌了很多。所以，就像個人電腦一樣可以讓我們在科技世界中悠遊其中，創新空間可以讓我們更自在地在物理空間中生活。

可是，即使這些空間分享了共同的價值，在 Barcelona, Berlin, San Francisco, Paris, Beijing 等的空間卻不盡相同。創新實驗室是 MIT 所發明的，成立於 2000 年早期，有著全世界的網絡。駭客空間則是另外的故事。其源頭是加州，可追回到 1970 年代的 Homebrew Computer Club，一群人聚在一起研發創新。許多結果免費被分享出來，包括了 Steve Job 和 Bill Gates 則是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而駭客中心則一直有駭客的精神，在組織的方面則和創新實驗室很像。即使寫程式對他們來說是很專業的，駭客空間則也有一定的配備可以生產東西。此外，就像創新實驗室，公共存取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是為了讓這些空間不要指給特定的研發創新使用，還可以及體分享和學習知識。

創新實驗室的運作是以一個網絡型態的新型生產生態系統為基礎的。許多觀察家認為這是一個新的工業革命，也是一種擺脫資本主義的前衛行動。但是我們不能走得太遠，好像以為這真的是美麗新世界。這些空間擁有許多創新的科技、政治、組織型態，雖然他們是主流經濟的邊緣人，但是其成功是代表社會、文化的轉變，也代表人們新的思維、設計、工作、生產、行動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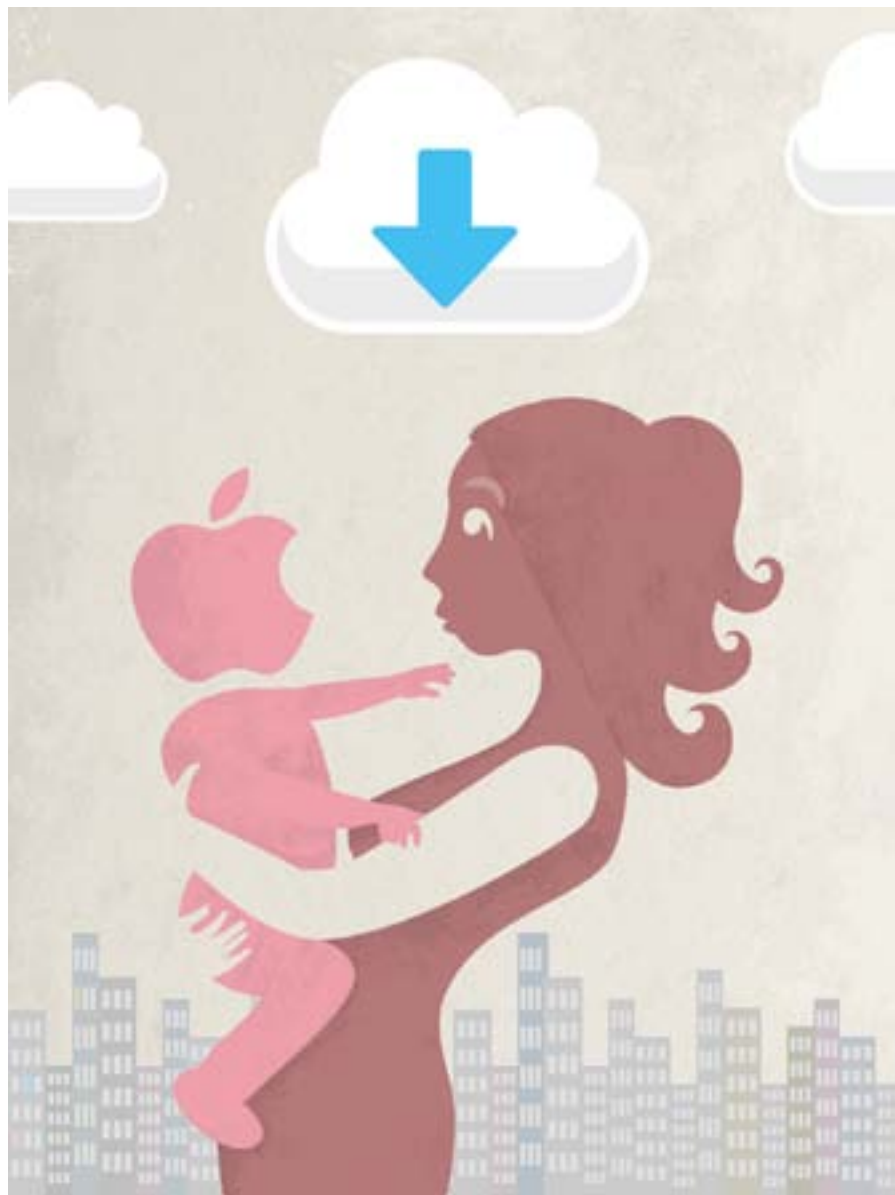
社會學家有人已經研究這些新的生產方式，雖然這些空間很不一樣，可是有著共同的組織模式，這些是從駭客社群中而來的。而這些開放的文化也帶進了新的生產和合作模式，有賴於平等的網絡結構。這也發展出新的分享成果和服務的方式，像是 Copyleft 執照 (1)。而這種創作的運動也從傳統的批判工業社會思想中得到靈感，William Morris 就是設計界中這種想法的先驅。

最近我們進行了對於北加州的駭客空間的訪問，顯示了這些空間都是由年輕的白人高教育者所組成，大約 30 歲左右，這些空間也有許多 Google 的工程師，對學術不抱持期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景：當駭客，然後用電腦創新，生產新的產品，甚至創造新社會。有些成員積極地在 Silicon Valley 進行實驗創新，而其他更激進地投入社會運動，像是 Occupy 運動。在這結構危機的年代，我想我們是很值得研究這些空間的，這是真正的烏托邦，有著新的工作方式，決策管理、消費、生活的風貌。■

來信寄給 Michel Lallement <michel.lallement@cnam.fr>

> 在多元能動的社會中追求性別平等

by Bernard Fusulier, FNRS,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 and Chantal Nicole-Drancourt, CNRS-LIS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Paris, France



圖：工作場所中有問題的性別政策。Arbu 繪。

女性下降的生育率，上升的失業率，以及母職的忽略，這些都讓社會風險提高了。雖然金融危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但是對於性別平等來說特別有害，讓家庭工作的不平衡更加嚴重。

政策制定者報告了越來越多人知道女性是個重要的角色，幫助鞏固社會。女性被認為在勞動和家庭都是重要的，這種雙重身分減少了制度的缺陷和不平衡，並且確定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新的全球共識承認了多數人希望可以照顧小孩和其他需要被照顧的人的同時，可以兼顧事業。他們希望支持這個雙重需要，但是沒有質疑現金性別分工的基礎，因為這個分工預設了男主外、女主內的立場。結果就是所有的國家都同意幫助父母去取得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

第一眼我們會發覺，公共的診斷似乎是性別中立的。重點在於就是要所有人都有工作收入。所有的福利國家中，或是那些正在建構福利體系的國家中，我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政策擴張，針對平衡工作和家庭而來，包括了稅制的福利制度的改革，還有幼兒照顧的系統，此外，平衡專業與家庭生活也是重點。

>>

而在所有的國家裡面，有個轉變正在發生，特別是在政策的實行方面。儘管有著性別平等的修辭，那些所提出的政治方法都在實踐領域裡失去了中立性。父母和家庭走向每一個人變成了是支持工作母親的方式。減少所有人的工作時間是透過許多女性打工的結果。而生育假的長度也應該要包括父母兩方。換句話說，核心的政策概念就是要針對女性而非男性和父母，因為女性將來都會成為母親。2014 年的 10 月，Facebook 和 Apple 就公開承認，要提供女性職位，好對抗這個由男性主導的勞動力市場，並提供可以幫助生育和鞏固家庭的方案。

這個圖像反映了改變家庭結構的抗拒，改變那些幫助工作家庭的方法。此外，維持母親的工作也便成是一個真實的政治問題，特別是在許多母親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兩頭燒時，更是需要。而這也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是否女性需要以離職為首要考量，以及生理與心理上是否可以平衡，而這樣的實踐是否符合社會正義。

而要調解專業與家庭生活是距離女人還很遙遠的。我們開始問了一個很理論的問題（怎麼幫助父母去平和

工作和家庭），但是我們只提供了一個方案（期待母親去賺取更多錢，但卻沒有改變基礎的分工不平等）。

繼續向前的話，動員必須從批判和重構組織與制度的基礎開始，重點在於薪資為基礎的 19 世紀社會結構和 20 世紀的福利制度。我們必須質問那些已有的社會安排和解構以這些為基礎的實踐。我們必須質問社會契約中的性別關係。也就是以生產回中心的世界預設了原子化的生產者，並需要由照顧者來支持。這就是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型。我們也必須解構生產和再生產的分割，以及相關的性別化實踐。

若我們嚴肅看待這些宣稱，我們可以開始去考慮另外一個社會的可能，開始去以新的參考框架去看待世界，把社會轉變成「多元能動」的社會。工作可以被重新想像成和其他活動有關，並且用社會投資的角度去評估工作，這些活動也不會是霸權或是只限於特定的性別而已。不活動或是沒工作就會變得比較少見，然後工作和家庭的需要將不會成為女人的負擔。

這個轉變需要新活動的進步建構，而「積極的」狀態將不會被定義成狹隘的有

工作而已，而是以更包容的工作、包括照顧和勞動等，來定義何謂積極。從這個觀點來說，社會將不會只是注重再有給勞動而忽略非市場型態的工作。反之，我們會向前行，邁向更寬廣的工作概念，強調並肯認各種活動的重要性，以及對於人類共善的貢獻。■

來信寄給 Bernard Fusulier
<bernard.fusulier@uclouvain.be> 和 Chantal Nicole-Drancourt
<drancourtchantal@hotmail.com>



工作中慢性疾病的協商

by Anne-Marie Waser, Dominique Lhuillier, Frédéric Brugeilles, Pierre Lénel, Guillaume Huez, Joëlle Mezza, and Cathy Hermand,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Paris, France

32

在法國，讓工作年齡的人口都有工作這件事情至關重大，因為整個社會已經高齡化，越來越多的人都有慢性疾病，特別是癌症。而這個數字每年都在增加，加上醫療的進步，早期診斷出來的人都會存活，但也越來越多人被診斷出有慢性疾病。幾乎 1.5 千萬的年輕人都有慢性病，大約是 20% 的總人口。

病友團體已經提出這個問題，並呼籲要支持那些和疾病與殘障人士住在一起很久的人。可是，負責的單位雖然研究許多疾病（肝炎、愛滋、癌證、硬化、糖尿病），但是也開始需要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他們也有興趣知道更多慢性病友的工作狀況。所以在這個脈絡之下，我們發展出了行動研究方案，讓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可以一起去研究：a) 什麼樣的狀況下，慢性病人可以照常工作；b) 介入去提供病人資源以及支持其工作。

這個行動研究方案在法國的 3 間公司執行。而過去 2 年半的時間，我們研究了那些想要回到工作崗位上的慢性病人，或是

想要繼續追求人生理想的人，但是卻沒有足夠的資源（照顧、老師、社區工作等）。為了瞭解這個社會狀況，我們考慮了三個階層的主題對象。第一，在人力資源和管理的方面怎麼和工作場合的健康與社會議題有所關聯。第二，負責管理慢性病人離職、續留、請假等等的人員。第三，那些回到工作場所的慢性病人和同事。我們分析了所有和這些有關的人，包括他們的生活、家庭、環境、社區等等，再者，我們也問了他們生活上遇到的困難，擁有的資源等等議題。

我們的研究並不侷限再那些被診斷出有慢性病的人而已。我們也進行比較，比較那些沒有慢性病的人，包括同事、管理階層等等，看他們怎麼互動。為了要得到補助的資源，管理階層都會要求慢性病的證明，並評估。重要的是，卻有多數慢性病人沒有申請這些補助資源。只有 250 萬的人申請慢性病證明，但卻也有 990 萬的人有資格申請。我們也看有證明的病友真的可以得到什麼，試圖瞭解為什麼那麼多人

>>

“Only 2.5 million people request certificates of illness, although some 9.9 million could do so”

不申請。

結果顯示了那些申請慢性病證明和領取政府補助的病友可能會有污名，被認為不公平。而這個證明的審核其實是很嚴格的，有各個領域的專家把關。不過，他們比較不瞭解工作的環境，因為同事和老闆可能會被排除在審核協商程序之外，影響到整個補助的結果。再者，第二個障礙是確實地執行這些補助評估，人力資源或是健康服務等等從上而下而來，卻沒有考慮到工作環境的動態關係。所以，這些方法通常忽略了非正式工作制度。而用互惠的原則的工作場合，在我們的分析之中，我們看到了工作環境是比較少類似爭議的。此外，互惠的案例中包括了個體和集體的行動。總之，在地的制度是鑲嵌在特殊脈絡中的。

我們的研究發現，成功的補助案例，也就是沒有污名的那些案例，有幾個相似之處，他們是法律評量和在地制度的配合，也有當事人的參與，而補助就是這種多向的協商結果。這樣一來，社會行動者是都會支持整個補助制度和對慢性病人有益的。

或許有人會質疑證明的正當性和相關的權利，但是也有人認為這是病人該有的權益。所以，這些考量之下，行動可以開啟地方的互惠環境，讓補助的給予者和接受者可以超過個人善意、幫助、補償等等的限制，我們也發現病友團體也提供了機會去參與其中，轉變工作環境。最後，他們也讓個體可以定義疾病的意義，建立自我認同，把個人處境帶到真正的集體權利領域。■

來信寄到 Anne-Marie Waser <anne-marie.waser@cnam.fr>

> 慶祝印尼的民主

by Lucia Ratih Kusumadewi,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Indonesia,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s on Sociology of Religion (RC22) and Social Cla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RC47)



圖：Jakarta支持Joko Widodo和Jusuf Kalla的群眾，

“「大家好！耶（勝利手勢）！別忘了投給 Jokiwi 喔！」Slank 是知名的搖滾樂團，於 2014 年 7 月 5 日在一場造勢活動中帶動歡樂的氣氛，並要大家支持總統候選人 Jokowi 和副手 Jusuf Kalla。這場造勢活動有數萬名的支持者到場，年輕或年長，男與女，貧與富，聚集在一起大聲歡唱。而稍晚，大家等待的人終於出現了：Kokowi 站

上了舞台中央，和支持者揮手見面。整場的氣氛瞬間到了最高潮，大家呼喊著「Jokowi! Jokowi!」並比出勝利的手勢。

今年是第一次在印尼的選舉中看到了「真正屬於人民的民主」。愉悅的熱情非常激昂，無數的人都參加了選舉造勢活動，並頭數選戰，而總共的選舉募款也高達 295 億印尼盾。而選舉當天，

在選舉當天，因為先前的選戰大多拒絕金錢政治的遊戲，所以人民也非常關注並監督是否有選舉舞弊產生。

這是印尼民主的嶄新一頁。這個轉變事關重大，之前的黑金假民主和權力壟斷，到現在的改革、建立公民社會的努力，一路走來並不容易。在最近的幾次選舉中，以往的政治精英都失敗了，因為選民不再買單。我們已經看到了因的政治文化正在產生當中。

而轉變的原因是什麼呢？很少觀察家預測到這個轉變，特別是印尼有著這麼長久的貪腐政治歷史。顯然地，所謂的「Jokowi 影響」是一個轉捩點。不過特殊的環境是促成轉變的重要因素。在某些時間點上，大家傳遞訊息說「現在正是時候！」也就是說時候改變了，要終結混亂、貪污、壟斷權力的政治。

Joko Widodo，也就是 Jokowi，已經變成了過去兩年來最受歡迎的人物之一。他是 Central Java 的 Solo 市市長，大家認為他工作勤奮，誠實。大家也喜歡他具有人性的政策，打擊貪腐，並打 Solo 打造成旅遊的中心。2013 年 Jokowi 被 City Mayors Foundation 認為是市長排名的第三，而 2014，Jokowi 的名字在 Fortune 上面被稱為「當今 50 大世界領袖之一」。

Jokowi 在 Solo 的成功讓他成為政治新星。他也被印尼的民主鬥爭黨 (PDI-P) 所提名，該黨是主要的反對黨。後來 2012 年他贏得了首都 Jakarta 的選舉，和副市長 Tjahaja Basuki Purnama (Ahok) 一起開啟了一系列改革，像是洪水控制，塞車控制等等，這都是之前被忽略的議

題。此外，他們也進行都是規劃，健保，教育等改革。

而 PDI-P 提名 Jokowi 為總統候選人，和 Jusuf Kalla (JK) 搭檔競選。JK 是 Golkar 檔的老手同時也是副總統，其競選主軸是要開啟印尼的「心靈革命」，而 Jokowi 要印尼人民和他一起來做這件事情。反貪腐和透明、互助、創意、獨立、尊重差異等等都是重點。

而兩人成為競選搭檔之後，民調支持度持續上升，特別是民主運動人士，學者，音樂家，年輕人，學生，商人，大眾階級等等特別支持。支持者都自動自發參加活動，一些人甚至自掏腰包。而相反地，其對手 Prabowo 和 Hatta 主要是被貪腐的集團，金錢，保守派所支持的。

2014 年 7 月 22 日，選委會最後宣佈了 Jokowi-JK 的勝利，獲得了 53.1% 的選票。而對手 Prabowo-Hatta 獲得 47.8%。許多分析家認為這是人民的勝利，並說 Jokowi 的勝利不是代表政黨的勝利。Jokowi 的支持者主要不屬於任何政黨，無黨無派。許多人甚至是第一次投票。

現在，我們對於印尼的民主有了新的希望。新的政治文化但生了，這將是印尼社會轉型的重要一步！■

來信寄給 Lucia Kusumadewi <lucia.ratih@ui.ac.id>

> 財團化印尼的教育

by Kamanto Sunarto,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Indonesia,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s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C04) and History of Sociology (RC08)



圖：Jakarta的學生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教育。

在印尼的改革運動於1998 終結了威權軍事政府統治之後，新的教育改革方案推出了，但是充滿爭議。從2003 年的憲法法庭成例之後，人民可以挑戰違憲的法律。而過去的十年間，

教育者，學生，公民團體已經把目標對準了教育相關法律了。

而1999 年政府頒布了一項法律，允許一些公共教育機構可以企業化。而理由是要讓教育可以更自

>>

主，提昇全國的競爭力，好來回應競爭激烈的全球化浪潮。結果，在 2000 和 2010 年之間，政府私有化了 6 間公立大學和 2 間公共教育機構。

公共大學的私有化引起了很大的反彈，特別是來自家長和學生。過去的學費是由政府所決定的，而公共的高等教育機構擴張後，政府已經無法負擔龐大的開銷，所以學費成為了收入的重要來源。學費調漲已經是司空見慣。然而，抗議的人很悲觀，因為校方態度很堅決。

而 2003 年政府頒布了一項新法案，要把所有的教育機構企業化，不論是正式或是非正式的都要。而且，各種教育，高等或是技職教育，政府都要企業化。而這個法律在 2009 年正式頒布。

這兩個新的法案會讓現有那些私校集團感到威脅，因為他們的權力會大大縮減。2006 年有 16 所私校和非政府組織要求憲法法庭審查的個法案，特別是企業化的部份，可是這項要求被否決了，因為他們說法律還沒有生效。

家長，學生，公民團體等也開示要求審查這個法律，因為他們追求的是教育公共化，並防止企業化教育的事情發生，避免商業化。他們認為教育是公共財，而教育的整個支出是國家要負責的。他們認為任何法教育開銷轉嫁

到社會的行為都是違憲的。

2009 年，私校和非政府組織團體聯合學生、老師、講師、家長、學者等，來自各個領域，以起提出了 5 個要求審理 2003 和 2009 年法律的要求。這得到了回應，就是法院重新更改了 2003 年的法律，並且取消了 2009 年的法案。

在許多的案例之中，這些挑戰是針對教育改革許多面向而來，並反應了許多抗議者個社會位置。管理教育機構的組織有興趣的是去維繫整個私人教育機構。這些人反對企業化是因為他們可能會因此失去控制該機構的權力。而在要求審理 2003 年和 2009 年的法案之後，他們對於企業化的抗議也隨之中止了。

而 2009 年法案之後，政府又在 2012 年發布了一個新的高教法案，讓公共教育可以企業化。2013 年的大學法律系學生要求審查 2012 年法律的其中 6 項，不過被拒絕了。

而什麼上學生、家長，學者、社會團體成功可以上憲法法庭的呢？雖然 2003 年的法律被修改了，2009 年的取消了。但是免費教育和反對企業化並沒有實現，總之，法庭的意思是：

1. 學生必須付學費，並且政府有權控管。

2. 公共高等教育必須

要分配預算的 20% 去獎勵表現好的貧窮學生，但是最多就是 20%。

3. 公共教育機構允許不同的學生來源，而憲法把這個決定權看作是 affirmative action, 但是學生看到的飾品化。

4. 而合格的公共教育機構一直都沒有反對。

學生，家長，公民團體已經用盡所有的方式去爭取免費公共高等教育了，但是憲法法庭的節論是不能修改的。這項挫敗讓整個運動士氣大失，目前也沒有新的計畫去反對高等教育商品化。然而，學生仍然持續反對高學費，並且爭取給於貧窮學生的補助，可是現在決定權落在學校身上，而非政府。■

來信寄給 Kamanto Sunarto

<kamantos@yahoo.com>

> 印尼的勞工運動 和工人階級政治

by Hari Nugroho,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Indonesia,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s on Labor Movements (RC44) and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s and Social Change (RC48)



圖：印尼的勞工運動，呼籲工人階級團結起來。

印尼的勞工運動在政治上消失了一段時間之後，現在似乎又復甦了。2014 年，幾位工會領袖被選為地方代議士，這是一項歷史性的成就，因為在過去 50 年間從來沒有這個例子。隨之的辯論，像是工人鬥爭從工作場域擴張到其他的場域，正在展開之中。而過去也有類似的政治實驗。而我們要問的是：工人運動可以轉變印尼的階級政治嗎？

經濟的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在威權正體

>>

於 1998 年瓦解時開始的，這帶來了新的挑戰，包括勞動場域的衝突。而國家的控制也被市場所取代，流動的資本在高度競爭的全球市場中成為了新的敵人，也就是對工會發展的衝突。而新工會的基礎已經被過度彈性的勞動市場所侵蝕，即使在 Suharto 政權解體時的新工會成立時也是。

今日的情況讓工會聚焦在反彈性化。傳統的方案包括了增加工資，集會自由，反對資遣等等，也被納入新方案。工會也批判國家的自由化勞動政策和企業的危險工作環境 (Juliawan, 2011)。工會因此要爭取更有效的社會安全系統，使得讓工作不穩定的情況得以改善，也讓工人的傷害減輕到最低。而工會運動也在再社會福利系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創造了更多的工會人數。

而工會人數的增加也代來的新的挑戰，特別是工會為了要去得到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支持，去面對市場的侵略。雖然許多工會仍然很保守，很多地方工會也和進步的全國工會合作，主要追求兩個策略。第一是納入那些潛在的領導者，特別是在工人階級的社群裡面，但也和其他的群體見李關係，包括了農夫和小販。第二個策略逝去影響選舉政治。這裡的目標是建立地方議會的代表性，開創一條邁向全國議會的路，去影響政策制定的過程。參加選舉也是一個擴大工會支持的策略。

而工業衝突的圖像和工會主議的轉變，這兩者在後 Suharto 時代可能激起了更多的工人階級運動。但是收穫還有待確認 (Hadiz, 2001)。例如，兩個進步工會的領導人都在 Bekasi 工業地區，靠近 Jakarta，他們都成功的在 2014 年選上國會議員，從這次開始，他們螢得了軍隊的支持，這也是一個成功實驗。這個歷史性的事件之後，全國工會領袖也採取了更具有爭議性的位置，介入 2014 的總統大選，去動員工會成員支持某個候選人，而該候選人是 Suharto 威權時代位居要職的官員，也被伊斯蘭群體所背書，在工人階級中沒有什麼支持者。這也產生了一個主要的問題，那就是關於工會領袖的階級政治利益。

同質，許多其他的工會實驗在地方選舉都失敗了，因為沒有贏得足夠多的選票，連工人也不太投票給他們。許多人贏得選舉並不是透過工會的資源，反而是其他的政黨給予支持才當選。這些人不搞階級政治，而對金權政治和其他宗教意識形態競爭比較感興趣。

一個類似的情境在他們擴大工會成員時也看得到。雖然一些工會很成功地建立廣泛的網

絡和交換社會政治的支持，然而卻很難建立策略性的共同利益。每個群體都要去保持自己的影響力，而支持都是透過群體尖的交換而來，和工人的利益全然無關。相似地，成功地推動全國社會安全系統也讓工人階級和更廣大的社會群體連結，但這不能被視為是階級政治的成功。這反應了跨階級的聯合，而非工人階級的利益。

雖然有樂觀的一面，不過現今印尼的勞動運動是有所不足的，特別在社會基礎上是如此。雖然年輕的一代組成了主要的勞動市場，也是工會的支柱，但是從來沒有在威權統治下生活過，反之，他們是歷經去政治化的一代 (Caraway et al., 2014)。勞動衝突、社會運動、集體意識等等，這些都不足以可以行程一個鞏固的階級政治基礎。此外，跨階級的利益和吉他認同，例如宗教，也是工人階級政治的敵手。

來信寄給 Hari Nugroho <hari.nugroho@ui.ac.id>

References

- Caraway, T. L., Ford M., Nugroho H. (2014) "Translating membership into power at the ballot box? Trade union candidates and worker voting patterns in Indonesia's national elections," *Democratization*. <http://dx.doi.org/10.1080/13510347.2014.930130>
- Hadiz, V. R. (2001) "New Organising Vehicles in Indonesia: Origins and Prospects," in Jane Hutchison and Andrew Brown (eds.) *Organising Labour in Globalising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Juliawan, B. H. (2011) "Street-level Politics: Labour Protest in Post-authoritarian Indone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1(3): 349-370.

> 當宗教成為合法的認同

by Antonius Cahyadi,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Indonesia,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ology of Religion (RC22) and ISA Thematic Group on Human Rights and Global Justice (TG03)



圖：印尼的身份證上有宗教欄位。

在 Suharto 時代的尾聲 (1990 年代)，印尼的公共領域充滿了宗教情緒和種族排外的氛圍。穆斯林、華人等被視為非印尼人，在那時相當辛苦。這些敏感的議題在 1998 年的暴動之中被突顯出來，並啟動了「改革」，讓 Suharto 的新政劃下了句點。

對於印尼華人的種族歧視在 2000 年被印尼的第四任總統 Abdurrahman Wahid 廢止了。這個是在 1967 年 Suharto 上台時的政策。儒教是印尼華人的傳統宗教，並在 2006 年被定為合法宗教。當種族歧視比較退潮的過去十年間，宗教的歧視還是持續著。而這個議題也相當敏感，人們都在公共領域中盡量避免談論這個話題。政治場域沒有任何宗教的討論。

而綜觀印尼的歷史，宗教一直被政治所用。在 1970 年代，宗教合法認同的官僚化到達的最高峰。在荷蘭殖民時代（從 19 世紀早期到

1942 年），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是被認為一種政治威脅的，因為它可能備用做反抗殖民的手段。而殖民政府讓「宗教的伊斯蘭」繼續，可是壓制政治上的伊斯蘭認同。類似的政策也禁止了原住民的宗教活動。所以宗教被限制在個人的領域。

在日本殖民期間 (1942-1945)，伊斯蘭教變成了戰爭的策略。日本人動員印尼的穆斯林群體的反荷蘭情緒，開啟了一個政治部門，專門去掌控和動員伊斯蘭運動。在印尼獨立之後，這的部門變成了宗教部。

在印尼獨立的早期 (1945-1959)，部份參與獨立運動的伊斯蘭團體認為他們功不可沒，所以提議讓印尼成為伊斯蘭的政教合一的國家。另外，世俗的民族主義團體，包括了伊斯蘭和非伊斯蘭的，則認為印尼應該包容各種宗教。

而這兩派之間的妥協則在 1945 年的印尼憲

>>

法 29 條中可以看見。首先，印尼並不是一個世俗國家，因為其是建立在神的信仰上的，可是，這並沒有說是什麼宗教的神。此外，印尼也保障宗教自由。但是妥協還是有，那就是在 1946 年的宗教部的成立，這是為了伊斯蘭教而設立的。

在 Sukarno 的「領導民主」(1959-1965) 時代，宗教團體和非宗教團體之間越來越分歧。而另外不同宗教（伊斯蘭和基督教）之間也越來越緊張。Sukarno 的民族主義團體傾向社會主義，所以在這個議題上比較中立。為了讓宗教團體在無神的共產主義攻擊中感覺到被保護，以及爭取其他的宗教團體支持，Sukarno 於 1965 年引介的反褻瀆法。後來這個法案成為了伊斯蘭化的基礎，因為這特別是用來禁止人們做出反對宗教的舉動（特別是伊斯蘭教）。

在 Suharto 時代 (1966-1998)，宗教變成相當官僚。反褻瀆法案成為了公共領域中宗教的護身符。有了這個法案，Suharto 政權承認許多宗教，像是伊斯蘭、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但是不包括儒教和在地信仰。

從 Suharto 時代，印尼公民必須要公開在身分證上說明自己的宗教。而宗教部也成為了國家權力的執行者。此外，1974 年頒布的婚姻法律也讓宗教權力在政治上擴張了，也就是若要結婚和生小孩，那麼一定要先有宗教信仰。同時，1989 的宗教法庭法案也讓宗教影響力有了更進一步的擴張，到了法律場域之中。宗教成為了合法認同。而宗教部也讓宗教的權力擴張了，賦予力官僚的地位，而且穿透了國家部門，進而區分公民身分。這是 Suharto 如何把宗教收編的故事。

而隨著改革（也就是 Suharto 在 1998 的辭職），印尼的公共領域變成了多團體競逐的場域（宗教、族群、地分、民族群體等），爭取公共的注意和國家的認可。在改革時代也出現了政治化的伊斯蘭運動，發生在 1999 年，在 Moluccas 的一場宗教衝突中他們被驅逐了。這個事件導致了對於其當沒有被承認的宗教和其

他的伊斯蘭群體 (Ahmadiyya, Shia, Sunni) 認同可以在公共場合中公開。2006 年後，儒教和其他地方信仰後來的承認也讓其他沒有被承認信仰的人可以結婚。現在的人可以讓身份證上的宗教欄位空白了。

可是，宗教在政治上還是很有影響力，這說明了宗教還是比其他的社會文化力量還要有影響力。宗教在印尼的公共領域也是複雜的。可是，很顯然，當宗教成為了合法的認同，就會變成國家的工具，被統治者所用。印尼的政府就是最好的例子，也就是說宗教可被國家所收編，用來掌控人民日常生活。如此一來，宗教成為了政治，不再具有神聖性。■

來信寄給 Antonius Cahyadi <antonius.cahyadi@ui.ac.id>

> 在印尼社會 向上流動

by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Indonesia,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s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C04)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RC28)



圖：Jakarta的社會階層化

印尼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經濟復甦起來了，從中收入國家變成了G20的成員。此外，印尼也達到了政治、金融和經濟的穩定階段，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之一。(World Bank, 2014a)儘管這個令人稱羨了成長，不平等也惡化了。看看印尼的基尼係數就知道，從1999年的0.33到2011年的0.41。這個各化趨勢可能帶

來的結果就是貧窮的持續，緩慢的經濟成長，以及頻繁的社會衝突和緊張。此外，不平等也反應了不公民的公共社會服務的取得。一個在底層的小孩有43%的機會會有成長緩慢的問題，而上層的小孩只有14%的機率。同樣的，輟學的機率也相差甚遠：71%的底層學童很早就輟學，而只有26%的上層階級小孩有這個現象。(World Bank, 2014b)

很多年以來，印尼的不平等已經是個顯著的現象了，特別是在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上。而什麼樣的人再這個流動中是最成功的，又受到什麼樣的因素影響了呢？我的研究檢視兩個省的都市不平等，企圖回答這些問題。兩個省是東爪哇和西爪哇。資料來源是印尼家庭生活調查(IFLS)1993-2007年的貫時性資料。這個樣本包括了1177位男性和女性。年齡層從20-64歲。

而印尼都市的社會流動對於上層階級來說是比較大的。(Pattinasarany, 2012)資料顯示了有27%的下層階級流動到中間階級，而45%從中接階級到上層階級。事實上，對於下層人民來說，流動機會是很渺茫的。就像階級的僵固性，職業的僵固性也是很顯著，多數人繼承了父母親的職業。

關於性別呢，在控制了職業之後，男性更有可能向上流動，對於下層階級來說，這個性別因素更加顯著。這個結果顯示了社會要求女性去扮演女性的角色，在家中或是職場上都是如此，讓她們忙不過來，更不可能向上流動。此外，教育也是顯著的變項之一。高教育的人有多的機會向上流動。而父母的階級也有很大的影響，影響比教育還大。

而我在爪哇鄉下的質化分析中發現的結果和我的量化分析結果是吻合的，下層階級很難往上流動。可是，有趣的是，我看到了例外。有三個例子：

- 許多人選擇到國外工作，當移工，特別是家務勞動(女性)和工廠或建築工人(女性)。而選擇當移工的決定主要是受到工作機會缺乏的影響，這對於低教育的印尼人特別是如此。此外，移工做同樣的工作來說，可能比在印尼還賺更多的錢，而他們甚至有能力的匯款回到家鄉。這些匯款可以幫助移工家庭向上流動。

- 另外一條路徑是透過代間的特殊技能的傳承。在西爪哇的Garut社群中，理髮師是最有名的。幾十年來，這個技能被一代一代傳承了下來。許多都市成功的理髮店都是從這邊而來。特過這些特殊的技能，家庭是有較多的機會向上流動。

- 第三個路徑是創業。在許多村莊，有許多的創業者一開始是自雇業者，但是後來成為了小有規模的店，然後甚至擴張到了鄰近的村子裡面。這通常都是小本生意，像是餐廳或是零售商。而根據地區的不同，許多的創業者可能跟銀行借貸或是從政府那邊取得資金，跟社會企業合作。成功的創業是會造成向上流動的。

進一步的研究是要去解釋印尼的社會階級結構的僵化，以及為什麼停滯的社會流動會持續。這些研究希望可以帶來進一步的政策討論，進而改變社會流動停滯的現狀。■

來信寄給Indera R. I. Pattinasarany <indera.pattinasarany@ui.ac.id>

References

Pattinasarany, I. R. I. (2012) Intergenerational Vertical Social Mobility: Studies on Urban Society in the Province of West Java and East Jav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Graduate Program, 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World Bank (2014a) "Indonesia: Avoiding Trap."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4. Jakarta: The World Bank Office.

World Bank. (2014b) "Understanding Inequality." Booklet from Big Ideas Conference. Jakarta: World Bank Group, September 23, 2014.